

传统“最优化”财务决策思维范式之转换

常叶青

(山东工商学院 山东烟台 264005)

【摘要】“理性经济人”假设决定了传统的“最优化”财务决策思维范式。本文以中西方的决策管理思想为基础,探索适合我国现代企业的财务决策目标、准则、方法,以转换传统的“最优化”财务决策思维范式。

【关键词】 决策管理思想 思维范式 最优化 转换

传统财务决策思维范式是“最优化”原则的产物,“最优化”原则来源于古典经济学的规范决策理论,该理论认为决策者是“理性经济人”,掌握着完全的决策信息和完备的决策知识,能够做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因此,决策的“最优化”理论一般是指人们总是希望通过对各种可行的方案进行比较,以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作为可行的方案。“最优化”理论被当代财务管理学吸纳,认为决策者在财务决策中应追求最优的筹资、投资、收益分配等财务决策方案,以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的最大化目标,由此形成了追求“最优化”的传统财务决策思维范式。

现代企业所面临的经济环境、金融环境、法律环境等外部理财环境因素的不确定性增强,对未来将越来越难以准确预测,这使得以“最优化”为特征的传统财务决策思维越来越难以指导实践。因此,有必要从中西方决策管理思想的比较中吸取精粹,转换传统财务决策的思维范式,以更好地指导现代企业财务决策的实践活动。

一、中西方决策管理思想的启示

1. 西方现代决策管理思想的启示。

现代管理学的行为决策学派和权变学派的决策思想为传统财务决策思维范式的转变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所谓行为决策理论,就是用行为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对人类的决策活动进行描述、解释和预测的一种理论。行为决策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西蒙提出,在决策过程中,理性的成分十分有限,决策是在有限理性的基础上做出的,“理性经济人”仅是一种假设。基于有限理性原则,西蒙提出以“令人满意的准则”来代替“理性经济人”假设之下的“最优化”原则作为决策的准则。

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管理学家弗雷德·卢桑斯为代表的一批管理学者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权变管理理论。该理论提出企业要在管理中根据自身所处的内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随机应变,认为没有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管理理论与方法。该理论反对不顾具体的外部环境而一味追求最好的管理方法和寻求万能模式的教条主义,强调要针对不同的条件采用不同的管理技术与方法。

2. 中国传统决策管理思想的启示。

(1)以“易”为核心的《周易》决策管理思想。《周易》倡导易道,易道显示的决策管理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周易》是以阴阳相互转化而阐发万象的。管理者应效仿天道,崇尚刚健,阴阳和谐,精于刚柔动静变化作用不息的法则。②《周易》论太极,太极讲决策。决策是否正确,取决于管理者是否精于变与不变的法则。管理者应依内外情势的变化而持变易之道。不易是战略,是原则,是“执经”;变易是战术,是方法,是“达权”。③《周易》讲安人之道。管理者要通过各种和谐的方法与被管理者相安融合,平等共存,彼此诚信,求同存异。安人之道在于追求天人和谐,人人感应,人物协调。④《周易》讲中庸之道,认为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即中正之道。⑤《周易》强调君子以修德。《周易》认为,德者,管理之根基。

(2)以“人”为中心的儒家决策管理思想。贯穿于儒家决策管理思想的一个基本精神便是以“人”为中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在儒家看来,人是决策管理活动的中心。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在管理决策中,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开展的。决策者应“修身”才能“安民”。②儒家的执经达权之道来源于《周易》。儒家认为,只有将“执经”与“达权”相结合,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决策管理者。③“安人”的观念是孔子提出来的,孔子曰:“修己以安人。”孔子的“安人”思想是儒家决策管理的根本目标。

(3)以“道”为核心的道家决策管理思想。老子认为,“道”不仅是世界的本源,也是普遍法则。老子认为道法自然,遵循客观规律,顺其自然,才能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老子的“无为”思想,用现代语言来说,是一种领导艺术。它要求管理者修身养性,能则天法地、效法自然、正心诚意、静心寡言、见素抱朴。

(4)以“法”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法家决策管理思想。法家主张“法治”,认为离开一定之规,一切圣贤明君、能工巧匠都无能为力;遵守法律制度,任何普普通通的人都能取得管理上的成功。法家认为管理者在“法”、“术”之外,还应有“势”,“势”是对“法”的权威性的保障,“术”是为了弥补“法”与“势”在权力控制上的漏洞与不足。

(5)以“谋略”为中心的兵家决策管理思想。孙子指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夫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所谓“庙算”，实际上就是对战争全局的规划与指导。“庙算”的具体内容是“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这五事是谋兵必须参照的关乎兵战胜败的重大方面。孙子一再强调战争形势的变幻无常，可以说，孙子的学说是一部处变的学说。

二、比较中西方决策管理思想，确立科学的现代财务决策思维范式

1. 中西方决策管理思想之异同。

(1)决策目标的中西方比较。协和观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灵魂，它强调协同，追求和谐的境界。“和”意指和谐，是一种不冲突状态，是指调和不同以达到和谐的统一。它是一种重视和讲究事物整体结构内在诸要素之间“相反相成”关系的辩证观念。相比较而言，西方行为决策学派和权变学派虽对完全理性提出了质疑，但他们的研究主要着重于对决策行为的研究，对决策目标的研究着墨不多。西蒙在《管理行为》中提出，组织决策的目标是“满意”。这里的“满意”依然是以效率的寻求为导向的，只不过西蒙认为最大化效率的实现是不可能的，而“满意”的效率追求才符合现实。

(2)决策标准的中西方比较。《周易》提出了“中和”与“适度”的管理观念，这一观念亦被儒家承继并发扬光大。在孔子的思想中，包含了丰富的“尚中”观念。冯友兰先生曾解释孔子的这个“中”的真正涵义是“既不太过，又无不及”，是“恰到好处”。西方行为决策学派的“令人满意”其实就是“恰到好处”和“适可而止”，就是“中和”与“适度”。相比较而言，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是一种更偏重于情感的思维方式。

(3)“执经达权”的决策之道的中西方比较。权变的思想在我国传统管理思想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易”或“变”的决策管理思想，与西方权变学派的权变管理思想不谋而合。这种建立在“易”或“变”基础上的权变管理观，认为管理者只有熟知“执经达权”的道理，精于变与不变的法则，方能有所变而又有所不变，才能“视不同情况而定”，最终实现管理目标。为此，管理者应学会应变、善变。相比较而言，西方权变学派的权变管理思想较科学、严密，它通过具体的研究和建立环境变量与管理变量之间的权变关系来揭示权变的规律，从而使管理活动能够更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因此可以说，我国传统的权变管理思想更突出管理的艺术性，而西方权变学派的权变管理思想更突出管理的科学性。

(4)人性假设的中西方比较。我国传统的决策管理思想强调“人”在决策中的重要性，有着显著的人本主义倾向；而西方决策管理思想将重心放在对物的管理和对组织的管理上，是一种资本至上的倾向。西蒙提出“管理人”假设，意在指出“管理人”是按照“满意”原则行事的有限理性的人，是为实现一定的目的而合理地选择手段的决策者，他以追求决策的合理性作为主要目标。权变学派提出的“复杂人”假设，同样也是为组织决策服务的。“管理人”假设和“复杂人”假设虽然强调“人”在决策中的重要性，但都是以“资”为本的，与我国传统决策管

理想中实行以“人”为本的“伦理人”的人性假设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2. 顺应现代理财环境变迁，转换传统财务决策思维范式。

(1)“理性经济人”假设之转换。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家眼中的“人”是“伦理人”，西蒙提出的人性假设中的“人”是“管理人”，权变学派提出的人性假设中的“人”是“复杂人”。“伦理人”的人性假设过于突出道德中心主义，而“管理人”和“复杂人”假设又有漠视人的情感和文化价值观的技术理性之嫌。如果说“理性经济人”假设是企业财务管理实践活动的出发点，那么在此假设基础之上，决策者是一个有限理性的人，也是一个在一定价值观和文化背景之下的“伦理人”。

(2)“最大化”财务决策目标之转换。传统财务决策目标致力于对效益最大化的追求，这种追求已带来了许多弊端。当前，人类面临着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生态危机、人文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和价值危机等。在公司理财中，我们无法回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的协调，因此应追求一种天人和谐、人人和谐、人物和谐的决策境界。因此，现代财务管理应以“和”作为决策的终极目标。

(3)“最优化”财务决策准则之转换。以“中”或“适度”来转化“最优化”，作为财务决策的准则。冯友兰先生曾言，“中”的观念在《中庸》里得以充分体现，而“中”很像亚里士多德的“黄金中道”的观念。亚里士多德说：“只有在适当的时间和机会，对于适当的人和对象，持适当的态度去处理，才是中道。”也就是说，“中”是客观的，但又是具体的，“中”总是一定条件下的“时中”，离开了一定的时间和条件的“中”就是“非中”了。“时中”的标准的确立，符合决策者的实践经验，应和了西方决策学派的“令人满意的准则”，也有利于和谐的财务决策目标的实现。

(4)“确定性”、“程序性”财务决策方法之转换。对于今天的世界，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非连续性、无序、断裂和突变现象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因此，许多人放弃了用单一的、固定不变的公式、原理、定律来解释和说明当今的世界。权变思想实质上是人类在面对自身的有限理性与生存环境的不确定性的矛盾时，总结出来的管理智慧。因此，管理者不能拘泥于固定的程序化决策，而应融合中西方的权变思想，讲究决策中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结合运用。在决策方法的使用上，不仅要讲究变通的理念，而且当面对不确定的内外部环境时，要善于审时度势，采用“以变制变”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权变决策之道，避免因权变管理引发决策行为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从而避免采用程序性决策方法所带来的僵化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 常叶青：“最大化”之惑与而“中”至“和”。财务与会计(综合版)，2006；8
2. 冯达甫.老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 冯友兰.冯友兰选集(上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 亚里士多德著.苗力田译.尼各马科伦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